



走向“关系诗学”

陈长利 著

走向“关系诗学”

陈长利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关系诗学” / 陈长利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203-0542-6

I. ①走… II. ①陈… III. ①诗学—研究 IV. ①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404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凤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93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编号: 2014WB17)

目 录

导 言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研究现状	(7)
三 研究思路	(15)
第一章 核心范畴：文学形式、意识形态、文学接受	(22)
第一节 关系与话语：理解文学形式	(22)
一 文学形式传统理解	(23)
二 文学形式理解困境	(27)
三 文学形式重新阐释	(30)
第二节 描述与实践：理解意识形态	(32)
一 意识形态传统理解	(32)
二 意识形态理解困境	(36)
三 意识形态重新阐释	(42)
第三节 经验与阐释：理解文学接受	(49)
一 隐蔽动力：文学接受在历史上的文学功能	(49)
二 期待视野：先验结构与体验建构互动生成	(52)
三 实际应用：期待视野多种阐释方法可能性	(57)
第二章 模仿说：文学接受、传达形式与意识形态	(60)
第一节 形式观念：“模仿说”与“传达形式”	(60)
一 何谓“传达形式”	(61)
二 “传达形式”表现	(66)
第二节 关系形态：文学接受、传达形式与意识形态	(74)
一 “自然社会理性”传达关系	(75)

二 “宗教神学信仰”传达关系	(80)
三 “人文主义理性”传达关系	(83)
第三节 原因阐释：“传达关系”与“绝对命令”	(86)
一 “意识形态”与“神圣理性”	(87)
二 “口头传播”与“言语力量”	(94)
三 “对等思维”与“世界观念”	(98)
第三章 实用说：文学接受、表述形式与意识形态	(102)
第一节 形式观念：“实用说”与“表述形式”	(103)
一 何谓“表述形式”	(103)
二 “表述形式”表现	(106)
第二节 关系形态：文学接受、表述形式与意识形态	(113)
一 修辞层表述关系	(114)
二 类型层表述关系	(116)
三 中心层表述关系	(118)
第三节 原因阐释：“表述关系”与“话语策略”	(122)
一 “意识形态”与“王权崇拜”	(122)
二 “自然人性”与“世俗观念”	(126)
三 “定向思维”与“趣味阅读”	(129)
第四章 表现说：文学接受、审美形式与意识形态	(135)
第一节 形式观念：“表现说”与“审美形式”	(135)
一 何谓“审美形式”	(136)
二 “审美形式”表现	(140)
第二节 关系形态：文学接受、审美形式与意识形态	(145)
一 中介审美关系	(146)
二 实践审美关系	(150)
三 理念审美关系	(152)
第三节 原因阐释：“审美关系”与“大写之人”	(157)
一 “意识形态”与“个人主义”	(157)
二 “表述危机”与“立法之人”	(159)
三 “闭合思维”与“反思直觉”	(162)
第五章 客观说：文学接受、客体形式与意识形态	(170)

第一节 形式观念：“客观说”与“客体形式”	(170)
一 何谓“客体形式”	(171)
二 “客体形式”表现	(173)
第二节 关系形态：文学接受、客体形式与意识形态	(187)
一 “不透明”客体关系	(187)
二 “透明性”客体关系	(191)
三 “半透明”客体关系	(195)
第三节 原因阐释：“客体关系”与“结构—功能”	(199)
一 “意识形态”与“工具理性”	(199)
二 “知识划分”与“文学客体”	(201)
三 “形式思维”与“文本深蕴”	(205)
第六章 接受说：文学接受、自反形式与意识形态	(208)
第一节 形式观念：“接受说”与“自反形式”	(209)
一 何谓“自反形式”	(209)
二 “自反形式”表现	(214)
第二节 关系形态：文学接受、自反形式、意识形态	(228)
一 “消解性”自反关系	(228)
二 “交流性”自反关系	(231)
三 “生产性”自反关系	(235)
第三节 原因阐释：“自反关系”与“微观权力”	(242)
一 “意识形态”与“文化主导”	(242)
二 “范式转移”与“重视经验”	(244)
三 “经验思维”与“话语交流”	(247)
结 论	(250)
参 考 文 献	(262)
后 记	(276)

导　　言

21世纪以来，在破除“本质主义”迷信、反思“文化研究”不足之后，重新审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关系价值成为知识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潜在要求。中外文艺理论的发展趋势表明，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正走向一种打破即有成见与学科壁垒而注重文学内部和文学外部相结合的“关系研究”。我们认为，文学本性认识具有三个基本关系维度，即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文学接受是文学产生的基础和效果，文学形式是文学存在的标识与形构，意识形态是社会对文学的组织，也是文学进入社会的根本途径和方式，它们是阐释一个文学事件的基本关系系统。新的关系诗学的轴心关系将是围绕着文学接受、文学形式和意识形态三者关系而展开。这种关系研究应分为共时性的体系建构研究和历时性过程演变研究，当务之急，是历时性思想过程研究，因为，它是共时性体系建构的基础、前提和基本参照。本文将具体展现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三者关系在西方五种主要文学观念即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接受说中的关系形态和范式演替，并讨论它们的形式基础和生成机制。下面本文将就本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等问题加以简要描述和说明。

一 研究背景

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把文学形式看作文学存在本体，拒绝主体和意识形态介入；庸俗社会学文论把文学看作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工具，文学缺少自身的独立品格，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巨大裂隙。

在西方，提出弥合这种“裂隙”的，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接受美学，在历史提供的契机下，他们以解决“文学史悖论”为突

破口^①，以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及其变更为中介，试图搭建审美与历史之间关系得以沟通的桥梁，但是由于其方法论未能对所提出的基本假设诸如在“文本的稳定性”“读者”“阐释”“文学史”^②等方面的问题做出有效回答，使二者沟通的问题“悬而未决”。

随后理论“向外”偏转，“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③文学研究的热点由对重视研究文学语言本身、性质和能力的解读，转移到重视语言同自然、上帝、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关系的阐释学解释方面。文学内部研究遭受冷落，以话语分析为特征的文化研究，一时成为时代的新宠。

就在文化研究带来理论边界极大拓展的同时，引来另外一些学者的质疑，“这同文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呢？争论和异议就是从界定这种关系的过程中开始的”。^④在质疑者看来，文化研究所关心的技术统治问题、阶级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人权问题等，这些研究固然重要，但是终究是文学本身的缺失。

出于对文化研究不足的反思，一些理论者提出走向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结合性研究的设想。米勒宣称：“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将是在修辞学式文学研究同当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文学外部关系研究之间作调停工作。”^⑤托多洛夫认为，持“内在论”立场的批评理论注重文学内在构成因素的分析，往往忽略了艺术形象产生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意识形态批评又往往持外因决定论的观点，往往忽视文学内部构成因素的分析，“这样，‘结构主义者’在这方面的缺陷就可由意识形态专家来弥补，反

^① 参见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② 参见〔联邦德国〕H. R. 姚斯、〔美〕R. C. 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6—453页。

^③ [美]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的今天的功能》，载[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124页。

之亦然。”^① 正是在这种反思的浪潮中，审美与历史的关系、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的关系、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才再次被“问题化”，实质上，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表述。

如果说，接受美学把沟通审美与历史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是出于历史提供的“偶然契机”^②，米勒等人的倡议还带有“个人性”认识特点的话，那么，新千年西方出现的“后理论”思潮，则是这种“关系研究”的自觉性的理论思潮。

刘象愚对“后理论”的解释是，“提出‘后理论’时代的一些学者其实未必全然反对理论，而是反对数十年来理论逐渐走向空泛，脱离文学和文化研究实践的倾向，或者说反对理论背离传统审美批评，背离经典文本分析的倾向。”^③ 重视文本和文化研究是“后理论”的核心观点。“后理论”还强调理论的“自反性”，这种理论不是要求退回从前，而是强调不同的理论主张之间可能并非像以前那么对立。“后理论”者还重视诗歌的功能和读者接受，“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回归‘诗学’，回归卡勒早期著作中关于诗歌与叙事作品的作用和接收之类的研究了。”^④ 这突出了理论的读者之维。“后理论”还体现出一种宏伟的整体性视角，伊格尔顿指出，“后理论”应当在一种更宏伟、更负责的层面上，向后现代主义逃避的那些更大的问题敞开胸怀，这些问题包括“道德、形而上学、爱情、生物学、宗教与革命、恶、死亡与苦难、本质、普遍性、真理、客观性与无功利性等”^⑤。综合“后理论”观点，他们不仅有重振文化研究的气势，关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文化研究的阶级、种族、性别三大主题，而且还突出了审美和价值、艺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① [法]茨维坦·托多洛夫：《批评的批评——教育小说》，王东亮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87页。

^② 有关这种偶然契机，姚斯和伊瑟尔后来都做过解释。参见[德]汉斯·罗伯特·耀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4—5页。[德]沃尔夫冈·伊瑟尔：《怎样做理论》，朱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9页。

^③ [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译者前言。

^④ 同上书，第329页。

^⑤ 同上书，第338页。

在我国，反思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在新时期肃清“文学为政治服务”影响时就已经开始，“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的‘转型’历程就是‘社会—政治’型式逐渐被突破，内外结合的‘审美—历史’型式逐渐被建构的动态过程”。^①但是，由于我国现代文学理论基础薄弱，意识形态的僵化认识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彻底根除，社会经验领域自然感性成分居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工作重点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在这些因素制约、决定和影响下，虽然文艺思想领域经历了“为文艺正名”“现实主义和典型问题”的讨论、“人性、人道主义、异化”问题讨论、“审美反映论”讨论、“文学主体性”讨论、“文学本体论”讨论、“文学方法论”讨论、“语言研究”“文体研究”“叙事研究”“文化研究”“学科建设”“人文精神大讨论”“新理性精神提出”等等的探索与争鸣，使理论研究领域空前活跃并获得巨大收获，但是也存在整体性反思不足、学理性偏弱、体系建构的说服力不强等弱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逐渐成为我国理论研究的热潮。面对文化研究所暴露出来的文学理论“何在”“何为”“何去”问题，我国学者表现出同西方学者相似的担忧，“我们最大的担心还是由于文化研究对象的转移，而失去文学理论的起码的学科品格。”^②出于对理论的反思目的，学者们提出不同的主张。有的主张用“文学自律原则”来抗拒研究对象面临解体的尴尬，但是这无异于一种理论退守，“审美自律”无法回答文学的社会历史根基和理性旨向的问题。有的学者主张走向“理论的批评化”，但是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建立起来的那些一系列的基本概念、规律、原则、方法、技巧、普遍性等的实用性无异于“雪上加霜”，而且，如果没有这些概念、原则、方法、思想，批评从何而生呢？伊格尔顿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③同样，没有理论，也没有反省的批评。无论是退守过去，还是消解理论，均不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可行的路径。

^① 董学文、金永兵等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8—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页。

^②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39页。

^③ [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3页。

这时，另一些观点就显得格外醒目。钱中文主张，“站在审美的、历史社会的观点上，着重借助与运用语言科学，融合其他理论与方法，重新探讨审美的内涵，阐释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① 为了做到弥合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审美主义与现实主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裂隙，他提出对文学理论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观点。但是，如何才能做到更高层次的综合，被学者认为“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的”。^② 童庆炳认为，文化诗学追求在方法论上的革新和开放，不拘于学科性的限制，也不囿于文学自律，而是从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政治、伦理、哲学等跨学科的文化大视野来考察一切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问题，“从‘视界融合’中来诠释文本和问题。”^③ 他从接受理论借鉴来“视界融合”术语，试图在主体间交流和对话中把文化和文学贯通起来，体现出了一种方法论上的新视野。南帆指出：“文学理论必须考察某种文本的结构、组织方式，考察相对于这个文本的读者社会，还必须考察特定的意识形态氛围对于文本生产与读者期待视野的隐蔽控制。文学理论不仅分析文学的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分析文学如何历史性地存在。”^④ 可见，文学语言、读者社会、意识形态是他进入文艺理论问题研究的三个基本方面。至此，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在我国清晰呈现。

但是，关于“三者”的关系研究究竟该如何展开，并没有一致性意见。接受美学把审美与历史的关系研究限制在读者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性质而言却是政治理论。有的学者与其说是他们研究的关系理论，不如说他们只是表面借用了“关系思维”，在他们那里关系已经没有了具体规定性和历史性，他们并不关心关系的性质变化和空间主题，而没有规定的关系要么走向与相对主义同质的东西，要么陷入主观唯心主义泥潭陷阱；有的学者只是指出某些艺术类型的关系特征，从而使认识停留在局部的批评上；有的学者把这种关系研究上升到当代美学范式类型的高

① 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9页。

② 陆贵山主编：《唯物史观与文艺思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7页。

③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40页。

④ 南帆编：《文学理论新读本》，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导言第8页。

度，体现出较高的理论性和建构性，但往往局限在了关系认识本身，缺少整体性和历史性视野，因此，既不能建构关系美学的历史理论，也不能建构关系美学的思想体系。

我们认为，真正关系诗学或关系美学的研究，同样是一种历史理论，它一方面具有超越以往文艺范式的在各个基本问题方面崭新特点；另一方面它也有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类型更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它将是作为一种新的立场和出发点，能够实现对以往理论的反思与烛照，从而实现对以往理论的重新发现和重新理解，这些新的发现和那些被历史忽略的观点思想，将成为关系诗学历史理论的有机材料构成。

董学文用“转型”来描述理论研究的当下形势，“‘转型’的前方在哪里呢？我们大胆地预测，那就是依据‘审美—历史’的型式，建构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特色文学理论。”^① 董学文准确地指出了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趋向。当代学者贝克、拉什、吉登斯等人提出“自反性现代化”思想，认为“自反”的性质是“反叛”，而不是基于传统理论内部的一般意义上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深刻性”，用詹姆逊的话说就是：“如果这一对立最终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话，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整个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辩证水平上，选择一个新的出发点，按新的范畴把有关的问题彻底重新提出。”^② 詹姆逊深刻地看到了当代文艺理论即将发生的深刻变革。方克强把“关系主义”“整合主义”“本土主义”，^③ 看作是当代学者回应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所体现出建构性理论特点的三种典型形态，这指明了关系主义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而存在，还将作为理论而存在，而且，在我看来，“关系主义”是对一种新的文艺范式性质指明，“整合主义”“本土主义”是对在这一新范式中理论的更加具体的规定，因此，前者更加具有基础性认识意义。

如果说，对理论做整体性反思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学者思考的重要命题

^① 董学文、金永兵等著：《中国当代文学理论（1979—200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

^② [美]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俊汝、李自修译，天津：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③ 方克强：《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2008年第3期，第1页。

的话，那么，对于我国文学理论而言，就显得尤为迫切。目前看，我们对文学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认识还很模糊，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存在重大争议。诸如，文学形式怎样理解？意识形态如何认识？接受理论缺陷在哪里？期待视野是什么？为什么说接受美学方法论的有效性不足？该怎样重新理解期待视野才能使其焕发阐释效力？主要文学观念或文艺范式有哪些？它们的性质各是什么？它们的思想构成如何？它们的主导时间如何？这些观念下的文学形式各是什么性质？有哪些表现形态？在这些文学观念中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性质、变化形态、产生机制如何？不同的文学基本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什么是文学本体？这些观念已经穷尽了对文学的认识了吗？如果没有，新的观念将会是什么？它将为理论带来什么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基础理论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文学理论的各种思想不是孤立的存在现象，如果局限在单一的理论内部就容易作出片面的判断，如，对大象作出“柱子”“蒲扇”“绳子”的判断都各有根据，可是大象的整体形象依然在这些判断之外，理论有待于从个别性的认识研究走向理论间的深层对话和文学领域与历史领域的融通，这样的研究必然是一种关系研究。

出于对以上问题的反思和探索的目的，本文引用综合性视角和系统化的观点，从关系反思和理论建构的意图出发，以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为文学本性认识的三个基本维度，以历史上出现的“五种”最主要的文学观念即“模仿说”“实用说”“表现说”“客观说”“接受说”为分别的讨论场域，从形式观念、关系形态、原因阐释三个层面，重点讨论了“三者”之间的“传达关系”“表述关系”“审美关系”“客体关系”和“自反关系”五种复杂关系构成情况，并在结论部分对五种文学基本观念之间的关系作以简要述评总结，提出走向“关系诗学”的思想主张。

二 研究现状

本文是以文学接受、文学形式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为认识轴心的关系诗学的历史理论，并重点讨论不同文学观念下的形式现象基础、关系性质类型和展开形态、不同关系的生成机制。这样的课题研究，以往还鲜有理论者系统涉足。但是，就传统理论不断打破自身的限制而或向内或内外寻求的特点来看，无论是形式主义文论，还是社会学文论，都不乏一些独到

和深刻的见解，特别是接受美学从读者的期待视野及其变更出发，把自己理论研究的宗旨定位在弥合形式主义文论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论之间的裂隙，为本文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但是，本文并未把“两者”关系的研究局限在读者视域，从而摒弃了接受理论的“读者中心主义”认识局限。

形式主义文论向文学外部拓展。俄国形式主义文论代表艾亨鲍姆承认，形式主义者过去主要注意于文学技巧问题，理论倒是应该研究文学进化事实与文学生活之间的关系，他要求给文学社会学研究确立一个新方向，认为文学社会学迄今总是忽视文学历史事实的性质问题，他重新主张实证主义立场，声称被研究的材料才是首要的。布拉格结构主义代表雅各布森认为一种信息的交流行为包含六种要素，即发信人、收信人、信码、语境、接触、信文，区分了六种要素的不同功能，不仅使诗歌自身的存在特性得到更为具体的解释，而且，也说明了一个交流行为中其他要素对文本要素的决定和影响。

穆卡洛夫斯基断定材料和方法之间具有辩证关系，针对什克洛夫斯基认为文学理论研究只研究文学内部规律的比喻性的解释，他提出批评，“虽然‘纺织方法’现在仍是注意的中心，但是一点也已十分明显，即不能完全脱离开‘世界棉纱市场的形势’，因为纺织业的发展（也在直接的意义上）不仅服从棉纱生产技术的发展（这一发展系列的内部规律性），同时也服从市场需要，即供求关系。”^① 这形象地说明了社会与文学的源流关系。

菲利克斯·伏狄卡主张，由于各个时代的审美标准不一样，甚至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等的差异，会导致不同的审美眼光。洛特曼认为，文本的内部结构规则与该文本所属的文化代码之间存在相互的联系，是否能把一个文本当作文学文本加以接受，这是由接受者在解码的过程中所使用的代码来决定的。

作为形式主义文论的批评者，巴赫金把文学看成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既反映经济基础，也反映上层建

^① [俄]波利亚科夫编：《结构—符号学文艺学——方法论体系和论争》，佟景韩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筑，还反映其他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反映，不是“直接的”反映，而是“间隔的”反映，这中间隔着作家的能动创造，他通过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提出“复调”理论^①，“复调”小说拒绝同一个声音，主张“多声部”和“全面对话”。

形式主义文论并非铁板一块，不仅他们中各自观点有很大分歧，而且，形式主义文论在总体上还体现出发展趋势，以往一些学者仅仅把形式主义文论局限在内部研究来理解，不能呈现形式主义文论的完整面貌。根据彼得·施泰纳总结，形式主义文论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重视“形式技巧”，第二阶段重视“有机结构”，第三阶段把模式看作一个“体系”。^②事实上，形式主义文论同样是现代文学在思想领域的反思形式，它与审美经验领域，与意识形态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倘若以一种整体性视角、彻底反思的目光，并借助视域融合的阐释学方法，重新认识形式主义文论，也许不难发现这种理论系统的文学社会学思想。

社会学文论向文学形式深入。按照姚文放的观点，在国外，文学社会学主要有四派观点，即实证经验派、辩证派、发生结构主义派和苏联社会学派，在他看来，实证经验派，采用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方法，排除文艺现象中的主观因素，通过社会调查、专题报告、填写表格、统计数据等手段对文艺定量分析，把文艺视为一般社会现实，对文艺的审美价值不感兴趣；批评辩证派和发生结构主义派主要集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当中，这些理论往往“限于闭门造车式理论推演，落入纯粹思辨的套路”；苏联的文艺社会学受实证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影响，把文学作品视为历史文献、文化实例、个人传记，将文学史视为社会思想史，较之20年代的研究水平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我国，主要有两派意见，一派坚持文艺社会学的美学性质，结果模糊了文艺社会学与文艺心理学的界限，一派强调文学学科的社会学性质，却无视文学审美性质。^③这个概括基本描述出了

^① [俄]米哈依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载[英]拉曼·塞尔登编：《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

^② [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刘象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③ 参见姚文放：《现代文艺社会学》，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学界对中外文艺社会学认识的基本面貌。但是，近些年研究成果明显丰富与深化了这些认识。

卢卡奇从资本主义“物化”现实出发，提出“总体性”思想。他把文学艺术归结为一种意识形态，主张文学发展是社会总体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文学对社会的作用是以人性的陶冶为中介的。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主要研究外部世界对小说形式的影响，认为小说形式与创造它的具体社会集团有密切关系。

戈德曼把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理论、卢卡奇的审美反映论和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融会一起，创立了他的“发生学结构主义”理论。他认为作品的内在结构与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有一种异体同构的关系，作品的形式方面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集团精神”同源。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小说发展三个阶段理论，即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突出个性、强调个人作用的小说、表现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中深陷危机感的小说、表现在消费时代个人创造力消失的小说。

本雅明考察了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存在特点，认为机械复制时代，文艺从被少数人的垄断地位解放出来，从而促进了艺术的民主化，但也同时导致了艺术“灵韵”的消失。布莱希特从意识形态角度提出的一种独特的戏剧类型，即史诗剧。“史诗剧”的核心是“间离化”，其实质是通过独特的舞台组织方式介入经验的一种政治策略和手段。

阿多诺批判“整体性”的虚幻，抬高现代性作品。他认为现代作品的分解性、零散化的形式原则，正契合了当代社会人的存在的真实状态。审美形式恰恰是抗拒各种“奇异性”野蛮力量的规范。艺术形式在外在上“零散化”，而在内在上具有整一功能。形式是艺术与现实间“否定性”关系的中介，只有借助形式法则的整合，作品才具有审美的真实性，才能与现实疏离，对文明进程既贡献力量也对现实加以批判。

马尔库塞用“形式的专制”来概括真正的艺术中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他看来，美的形式同意识形态有质的区别，这种不同在于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完全同一，而审美形式与意识形态却发生着对立，真正的艺术在于通过重建艺术经验来改变生存经验。艺术形式是超越和否定，是对无序、狂乱、苦难的把握。

阿尔都塞批判黑格尔和卢卡奇的“总体性”，在他看来，社会是一种